



FADS

Frontiers of African Diaspora Studies

FADS, Vol. 1, No. 1, 2026, pp.163-177.

Print ISSN: 3107-1805; Online ISSN: 3107-1813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fad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FADS.26.01.13biirs>



走出工具化：中国非洲语言研究的失衡与重估

张天任（Zhang Tianren），胡杰辉（Hu Jiehui）

摘要：非洲语言研究在中国长期处于非洲研究与普通语言学的交叉地带。本文在梳理国内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将现有研究概括为语言政策与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结构语言学与类型学、非洲文学中的语言研究四条路径，指出其总体格局呈现出现实议题较强、本体研究偏弱、内部发展不均的特征。一方面，语言多被作为理解非洲政治和中非交流的工具，尚未获得独立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推进的背景下，研究重心仍未有效转向资源与技术适配的关键环节，此两重失衡，让现有研究难以回应数智时代对非洲语言知识生产的新要求。

关键词：非洲语言；中国非洲研究；语言本体研究；人工智能

作者介绍：张天任，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非洲流散研究前沿》编辑。研究方向为非洲流散文学与文学跨学科研究，电子邮箱：tr1239480358@163.com。胡杰辉（通讯作者），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非洲流散研究前沿》编委。研究方向为心理语言学、认知神经语言学。电子邮箱：jerrywho@163.com。

Title: Beyond Instrumentalization: Imbalance and Reassessment in Studies of African Languages in China

Abstract: African language studies in China have long occupied an intersection between African studies and general linguistics. Based on a review of relevant domestic scholarship,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four main research trajectories: language policy and sociolinguistics, applied linguistics, structural linguistic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and language studies in African

literature. It argues that the field as a whole is characterized by a strong focus on practical issues,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language as an object of study in its own right, and uneven internal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language has often been treated primarily as a tool for understanding African politics and China–Africa exchanges, rather than as an autonomous academic object. On the other hand,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dvances i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priorities have yet to shift effectively toward the key issues of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adaptation. These two structural imbalances have made it difficult for existing scholarship to respond to the new demands that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places on knowledge production about African languages.

Keywords: African languages; African studies; language studi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thors Biographies: **Zhang Tianren**,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editor for *Frontiers of African Diaspora Studies*.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African diasporic literature and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studies. E-mail: tr1239480358@163.com. **Hu Jiehui** (corresponding author), Dean of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and a PhD supervisor;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Frontiers of African Diaspora Studies*.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psycholinguistics and cognitive neurolinguistics. E-mail: jerrywho@163.com.

引言

非洲语言数量庞大、类型复杂，是世界语言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国际范围的非洲语言研究^①发端于 19 世纪的殖民扩张，早期多服务于治理、传教及一系列知识生产活动。直到 20 世纪，欧洲学界才逐步将其规范为相对独立的现代学术领域。二战后，美国语言学界的加入为非洲语言研究注入了结构主义、类型学、音系学等现代语言学方法，使其逐渐形成两条彼此交织的发展路径：一条重在考察语言与文化、政治、身份等社会问题的关系，另一条更强调从普通语言学的视角，研究非洲语言内部的理论价值。因此，始终处在区域研究与一般语言学的交叉地带，是非洲语言研究自诞生以来的知识底色。

相比之下，我国对非洲的系统研究起步并不晚。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以“三家店”——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为代表的研究力量，持续推动了国内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一系列非洲问题的学术积累，各大相关智库、学术刊物相继设立，非洲研究体系日渐成形。但相较整体的繁荣来说，我国学界对非洲语言的关注却始终不足。1964 年，《世界知识》发表了第一篇介绍非洲语言的文章《斯瓦希里语》，以不到三分之一页的篇幅介绍了这个非洲最大的本土语种，产生了积极的学术影响。次年，《语言学资料》连续发表了《非洲语言学》和《赤道非洲的语言概况》两篇文章，向国内引介了（前）苏联最新的非洲

^①本文指称的“非洲语言研究”并不局限于狭义的语言描写，而是围绕非洲语言展开的，包括政策、教学传播、结构研究、文学语言实践以及数字资源建设在内的研究域集合。

语言研究著作,但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也没能激发连续的问题意识。自此,非洲语言就以不稳定的、科普性的形式断断续续地出现在期刊杂志中,作为非洲问题在语言层面的延伸。直到21世纪中非交往深化、特别是区域国别研究学科体系的扩展,国内对非洲语言的关注才日渐充盈,开始由边缘走向相对系统。

不过,系统化并不意味着内部结构已经成熟。非洲语言研究在迫切现实需求的牵引下,呈现出明显的分化和不均。政策、传播、教学等方向的体量增长迅速,而涉及语言的形式、向内描写的微观研究则始终十分薄弱,若干方向之间还存在着交叉与错位。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语料驱动研究的快速发展,使语言资源问题进一步凸显,本就还未成熟的非洲语言研究体系,又持续面临着方法的更新与资源萎缩的压力。基于此,本文试探析当下该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而鉴于国内相关研究总量有限、发展脉络尚不充分成熟,本文不拟作单纯按时间推进的编年式综述,而是在梳理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归纳其主要研究路径、格局及突出问题,并据此讨论数智化背景下该领域可能的转向。

一、国内非洲语言研究的主要路径及其演变

国内非洲语言研究虽然成果总量有限,但已大致形成若干相对稳定的研究路径。截至目前,国内与非洲语言研究直接相关的文章共142篇,这其中包含了30篇硕、博士学位论文^①。仅从题材上看,这些成果大体涉及政治、教育、文学等若干方面,但从知识结构上,尤其是审视语言被置为研究对象所来源的问题意识,便可得到四条相对清晰的路径:一是语言政策及与其相关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二是应用语言学和跨文化传播研究;三是基于“本体”的结构语言学与类型学研究;四是着眼非洲文学中的语言研究。

不过,这四条主线不是同时、均衡地展开,而是在不同现实需求的牵引下逐步分流,并呈现出明显的先后关系与强弱差异。政策研究最早成形,也长期占据着主流位置;应用语言学与传播研究更多随着中非交往的深化而增长,有很强的现实导向色彩;结构语言学、类型学研究最接近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本身”,但起步较晚、体量偏小,近年才出现一定的增长势头;文学语言研究则主要依附于非洲文学研究的发展,更多作为一种相邻学科的延伸。此外,政策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在目的上多有交织,传播研究与教学、翻译实践在内容上勾连,对语言本身的研究又不可避免地与传播问题发生重叠。正是在这种先后有别、又彼此交叉的展开过程中,国内非洲语言研究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总体格局。

(一) 语言政策及相关社会语言学研究

在现有成果中,对语言政策的研究无疑是国内非洲语言研究中体量最大、形成最早、延续也最稳定的一条主线,主要从历时维度考察非洲语言政策的制定、嬗变,以及现有的语言状况和语言政治等问题。这部分成果脱胎于国内长期以来的非洲政治研究、历史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传统,因而

^①本文所统计的论文数据来自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经由关键词“非洲语言”及各种非洲语名称进行交叉检索,并由作者二次筛选后整理。若观照范围涵盖所有“与非洲语言‘相关’”的研究,则必然数量庞大、失去问题聚焦,故本文的综述对象表述为“与非洲语言研究直接相关”。另外,后标注“(英文)”的文章均发表在中文期刊《非洲语言文化研究》上,因此也归为国内研究,后不再赘释。

在路径上带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式色彩。多数研究都沿着“殖民前-殖民时-独立后-当代”的历史线索展开，通过国别个案来考察政策文本的形成及其实施后果。在理论层面则大多借用了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中的基本范畴，剖解非洲国家与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数量上，这一方向共产出 61 篇文章，学位论文就占了 9 篇。就总体取向而言，现有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类：描写性的和批判性的。前者构成主体，后者虽数量较少，却在近年显示出一定增长趋势。

描写性研究是整个方向的底座。国内的非洲研究长期以资料引介为任务，因此积累性的成果本身更适合承担一种“建档”的功能。加之非洲语言政策是贯通殖民史、民族问题、教育制度问题的核心，故研究者往往先需要把基本事实梳理出来，批判性的分析才有开展的平面。内容上，这部分研究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三：一，非洲各国政府如何及为何设定各语言的官方、边缘属性；二，各国政府如何推进各语种教育资源的分配与协调；三，各国政府如何通过鼓励文艺创作促进主要语种的丰富与发展。如黄月华《西非国家语言状况举要》、费敏《津巴布韦语言政策的演变及启示》、李金剑《尼雷尔与坦桑尼亚斯瓦希里语的语言规划》、赵启琛《塞内加尔独立后民族语言教育政策演变：政府与个体双重视角》等。费敏（2018，p. 126）强调了英语在独立后津巴布韦地区的生态粘性，指出为什么“虽然人们一直尽可能地减少在教学和考试中使用英语，但英语仍然在课堂中占有一席之地”；赵守辉和巴尔道夫（Richard Baldauf）（2012）讨论了语言政策中个体的能动性，并将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不同主体分为四类：有专业知识的人（People with expertise）、有权力的人（People with power）、有影响力的人（People with influence）和有兴趣的人（People with interest），探究了不同主体对语言习得规划走向的影响。这一划分为理解非洲语言政策中的多方互动提供了分析工具。习得规划是“四大规划”（即“地位规划”“习得规划”“本体规划”“声望规划”）的一部分，这四种规划的区分也是描写性政策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点。

随着相关研究积累增多，社会语言学、语言政治学等视角的引入，“为什么”、“怎么样”开始比“是什么”更显得需要讨论。批判性研究并不脱离前者另起炉灶，而是在其积累的基础上，对政策的解释框架作进一步反思。对这部分来说，思考的落点主要集中在：一，本土语的复兴政策何以未能充分实现其预期目标；二，被落实的语言规划未能关注到哪些因素，以及现有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本土语言发展，又在多大程度上衍生出新的问题；三，政治在作为策略制定的主体时是否造成、以及造成了何种消极影响。这部分包括李文刚《试析尼日利亚国家民族建构中的语言问题》、徐丽华等《坦桑尼亚语言政策的不足及启示》、费拉里《阿尔及利亚的语言政策：政治选择还是社会语言学策略？（英文）》等。李文刚（2008，pp. 58-63）指出尼日利亚政府在确定宗主国语言地位的同时，为了取悦大族体将其使用的语言定为国语，而“这种折中方案不仅忽略了众多的少数民族语言，还使尼日利亚语言问题更加复杂化”。费拉里（Férial Filali）批判了阿尔及利亚政府将语言问题完全服务于政治，致使了当今阿尔及利亚社会畸形的语言景观。

结合立项情况来看，自 2017 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语委等层面的相关项目相继出现，表明这一方向率先完成了从零散关注到相对稳定的、建制化的转变。就目前的布局而言，政策与社会语言学方向的基金项目是所有板块中最丰富的，共有五项，分别是：国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非洲语言政策与规划发展变革研究”（2017 年，徐丽华）、国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非洲马格里布地区的语言问题及语言政策研究”（2018 年，饶敏）、后期资助项目“非洲三国语言教育政策研究”（2018

年, 李丹)、国家语委重点项目“非洲国家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研究”(2020年, 李洪峰)以及国家语委重点项目“非洲主要国家语言使用与语言管理研究”(2020年, 王辉)。其中, 李洪峰团队于2023年出版结项著作《非洲国家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研究》, 王辉主编的《“一带一路”国家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第4卷·非洲)也于2023年问世, 聚焦非洲21国语言的状况、管理、教育, 李丹的结项著作《语言冲突视角下非洲三国语言教育政策研究》则代表了语言教育政策研究的深化。同时, 徐丽华团队还于2021年译介了日本学者梶茂树的《非洲的语言与社会: 多语言共生》, 为学界在宏观上理解非洲语言生态提供了参考, 社会科学出版社也在2023年译介出版了《非洲语言规划与政策(第2卷): 阿尔及利亚、科特迪瓦、尼日利亚、突尼斯》。总体来看, 原创研究成果与译介资源的同步积累, 都从不同层面推动国内这一方向形成相对稳定的知识基础。

不过, 这一最早成熟、最贴近现实议题的研究方向, 同时也具有最典型的、能够折射非洲语言研究生态的局限性。将语言问题高度抽象为治理问题、政策问题、国家建构的问题, 则必然会回避深入语言本身, 淡化具体的社群经验。此外, 多数研究对语言政策的聚焦惯性地集中在历史维度, 而对新时代的技术媒介和微观语言生活, 尤其是经济因素的关注仍显不足。在《阿尔及利亚的语言政策: 政治选择还是社会语言学策略?》中, 作者指出: “从政治-历史和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考虑, 总是比从社会-语言或经济的角度来考虑更容易。”(费拉里, 2023, p. 91)此观点虽略显偏激, 却也折射出国内学界对非洲语言政策的研究缺乏对深层经济问题的了解, 致使隔靴搔痒的普遍状态。这一判断确有根据: 在这方面, 国内仅有刘国辉和张卫国为《语言政策与经济学: 非洲的语言问题》(*Language Policy and Economics—The Language Question in Africa*, 2016)撰写了一份书评^①。

政策研究固然最能与中国非洲研究的既有传统接轨, 却也因此最容易使非洲语言首先被看作理解非洲政治社会现实的一种窗口, 而不是具有独立学术价值的研究对象。在这个意义上, 政策研究既构成了国内非洲语言研究相当坚实的起点, 却也为其遗留了后续发展的一种惯性: 当语言首先作为制度对象被把握时, 其与教学、传播和跨文化交流相关的研究便会自然地生长出来, 而面向语言本体的研究, 则更容易被推迟、忽视, 这也形成了对非洲应用语言学研究得以较早增长的现实与学术背景。

(二) 应用语言学与跨文化传播研究

与语言政策研究相比, 对非洲应用语言学层面的研究形成稍晚, 体量也相对较小, 但其变化轨迹更能体现国内非洲语言研究与现实问题之间的互动。计至目前, 这一方向共有35篇文章, 其中学位论文13篇, 构成国内该领域的第二条主线。从问题意识看, 这类成果主要将非洲语言置入语言教学、跨文化交流、翻译及国际传播的场域中加以理解。也正因如此, 该方向虽与语言相关, 却更多脱胎于国际关系、国际中文教育等外部学科, 总体色彩更偏实践导向, 本质上属于中非交流现实需求推动下形成的应用型研究群。

形成背景决定了这一方向的核心关注点。虽然内部的角度、形式多样, 但从路径上大体可归纳为三条。第一, 从源语国或接受国出发, 考察非洲语言在域外的推广、影响和教学实践, 如卡林

^①参见刘国辉、张卫国:《语言政策与经济学: 非洲的语言问题评介》,《语言战略研究》,2019年第4期,第92-96页。

《马里基础教育中推广民族语言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廖荣成《国别与区域研究视角下日本大学非洲非通用语教研开展情况探析——以斯瓦希里语为例》。第二，从中国视角出发，考察汉语在非洲国家语言教学中的生态与现状，如李明诚《汉语在尼日利亚外语教育中的现状及前景》、王永康《刚果（布）中文教育新发展的契机与挑战》、杨薇《非洲孔子学院的语言文化传播效果研究》。第三，同样立足中国视角，讨论中国文艺、政治作品在非洲语言场域的译介、影响，以及翻译过程中双语的交互问题，如何明星等《毛泽东著作非洲民族语言的翻译、出版与传播》《由〈中国画报〉到〈媳妇的美好时代〉——中国文化在东非成功传播的启示》、李坤若楠《中国影视剧斯瓦希里语外译及其在非洲的传播研究》。总体来说，虽在对象、材料上有所不同，这一方向的出发点大体可归结为两种：一是现实层面的“促进国际交流与文明互鉴”，二是学术层面的“借教学与传播实践返归考察语言本身”。前者构成主体，也是这一方向得以较快增长的主要动力；后者虽相对较少，但更能显示该方向与语言学研究之间的潜在连接。换言之是，先以现实交流为入口，再在局部研究中逐步触及语言结构等更具本体性的问题。

例如，部分涉及到汉语的非洲语言教学研究采用了比较的视野，在实践中将汉语与非洲语言进行横向分析，力求更好地为教学服务。例如马西友《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斯瓦西里语与汉语形容词语法特点对比分析》、马丁等《利用已掌握的非洲语言音韵学知识来增强汉语音韵学的习得》、布泰莱兹（Mthuli Buthelezi）《基于教学目的对祖鲁语和汉语元音的描述（英文）》，这类文章不同于简单的事实调研而逐渐向内聚焦，关注到、并在客观上推动了对非洲语言本身的研究，具有更显著的语言学学术价值。布泰莱兹的研究还基于汉、祖双语的结构特征，用 Python 编写了一个自动生成祖鲁语（Zulu）元音合并的代码^①，并建立了一个祖鲁、汉语元音发音的交互式计算机程序以辅助教学，这也是我国现有为数不多将非洲语言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文章。

在立项情况上，整体的建制化程度弱于政策研究。目前直接相关的基金项目仅有两项：国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非洲百年汉语传播研究”（2022 年，王辉）和国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非洲话语体系的构建、翻译”（2024 年，高彬）。严格来说，这两项项目的起点并不完全在非洲语言本身，而更多着眼于汉语传播，以及中国对非的话语建构问题。但它们立足中非语言互动的关注点也从侧面说明，近年来国内这一方向的增长与“讲好中国故事”“推进中非文明互鉴”“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等现实议题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此方向之所以成为一条强主线，并不在于它理论上是否成熟，而是因为它在现实层面具有更强的可见性和资源支撑。

（三）结构语言学与类型学研究

与前两类根植于政治问题、现实问题的成果不同，这一方向才真正将非洲语言作为普通语言学意义上的研究对象加以考察，开始关注其词汇、语法、音系等内部规则及一般语言学价值。它在逻辑上最接近语言“本体”研究，却未在数量上取得与其理论重要性相称的发展。事实上，国内 20 世

^①详见姆图立·布泰莱兹：《基于教学目的对祖鲁语和汉语元音的描述（英文）》，《非洲语言文化研究》，2024 年第 1 期，第 18-67 页。

纪中叶对非洲语言的启蒙正是以引介美国和前苏联的语言学研究成果为开端的^①，但后续未能形成问题传统，直到近两年来才作为国内语言学界主动将视线转向非洲的结果。这一方向共有 29 篇文章，其中学位论文仅 5 篇，体量薄弱，且相当一部分研究仍以教学实践或汉非语对比为起点，真正意义上面向非洲语言内部结构的成果仍然有限。

这部分研究以宏观和微观两条路径展开。但易见的是，前者在生态上比后者要充足、有序。宏观层面的探究强调非洲语言的普遍性，力图从整体上把握其不同于印欧“中心语言”的语言学特征，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三：一，非洲语言在声调、音系、形态范式等方面具有哪些不同于“中心语言”的特征；二，这些特征在一般理论建构中具有何种意义；三，将非洲语言纳入普通语言学之后，能够对既有理论形成何种补充、修正。典型成果如李倩《非洲语言的声调研究》、周晨磊《非洲语言及其类型特征》和钱有用《非洲语言音系研究的理论贡献》等，这三文分别从声调、形态类型和音系出发，对非洲语言的理论意义进行归纳与讨论。值得一提的是，这三文都出自《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开设的新专栏“中非语言类型研究”，该杂志近年来也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非洲语言文化研究》一起，担当了国内对非洲语言系统研究的主要学术平台。相关项目也主要集中在这一层面，如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非洲语言类型学研究”（2018 年，吴桐）、中国非洲研究院中非合作研究项目“中非语言类型研究”（2020 年），以及国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类型学视域下汉语和非洲语言声调的实证对比及跨学科应用研究”（2025 年，章婷）。其中，吴桐于 2023 年出版的《非洲语言类型学研究》从类型学视角对非洲不同语言的词、句、音进行了系统梳理，已是目前国内从普通语言学视角考察非洲语言最全面的成果之一。

相对而言，微观的、对单个语言作具体分析的研究就少得多，主要集中在斯瓦西里语（Swahili）和豪萨语（Hausa）等少数较具传播或教学基础的显学语种。如骆元媛《斯瓦希里语隐喻性谚语的体认与翻译》《斯瓦希里语中的阿拉伯语借词研究》《斯瓦希里语复合词的认知分析》、伊利伯姆旺吉（Iribemwangi）《盛语中的流变机制与词汇变体：群体内和群体外心理的影响（英文）》等，在内容上包括对语法形式、词性结构以及音系特征的观照。还有部分研究只是在进行普遍语言学分析时简短涉及到了非洲的个别语种，如林旭娜等《大称标记的分布及其语音象似性》、吴安其《人称代词及基本词的词源关系》。整体上的研究停留在点状分析，缺乏持续性的语料支持，因而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语种研究传统。

还需指出的是，这类微观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是将非洲语与汉语进行对比，用以服务传播或译介实践，在本质上构成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向形式研究延伸的一条过渡带。如王晶晶《斯瓦西里语与汉语语音对比研究》，李沐晨《汉语与豪萨语颜色词隐喻的对比研究——以白、黑、红为例》、周丽《汉语与斯瓦希里语量词对比浅析》等等。这些成果仍停留在“证明非洲语言值得研究”的层面，无论在广度、纵深还是研究的组织程度上，都与成熟的体系化、前沿化研究有一定距离。这种薄弱反映在数量上，体现的则是深层的研究基础问题，说明对非洲语言理论价值的认识虽已出现，但尚未转化为持续性的研究投入。

^①例如心水：《非洲语言学》，《语言学资料》，1965 年第 4 期；劳宁：《美国学者对非洲语言系属分类的看法》，《语言学资料》，1966 年第 2 期；方也：《苏联语言研究所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国外语言学》，1982 年第 2 期。

（四）非洲文学中的语言研究

第四条路径关注非洲文学中的语言问题，主要涉及非洲作家在文学实践中对语言的运用及背后的文化理念。与前三类研究相比，这一方向衍生于近年持续升温的非洲文学研究，这意味着其中的“语言”首先是作为一种诗学实践的方式被讨论。这一方向共有 17 篇文章，其中学位论文 3 篇，相对来说体量最小。

方向整体的问题意识较为集中，且大多围绕恩古吉（Ngugi wa Thiong'o）与阿契贝（Chinua Achebe）关于“本土语还是英语写作”的经典论争展开。代表如孙竹《从阿契贝看非洲文学的语言策略》、翟乃海《重访非洲文学语言之争——一个社会历史的视角》、姚峰《阿契贝与非洲文学中的语言论争》、袁俊卿《恩古吉·提安哥：流散者的非洲坚守和语言尴尬》等，大多关心两个层面的问题：一，非洲文学中语言选择的生态是怎样形成的，它与各种因素有何关系；二，作为文学表达的一部分，语言如何参与到非洲经验的书写中。除此之外，也有部分研究直接进入具体作品，对语言现象作相对集中的分析，如张荣建《非洲文学作品：语言学分析》、侯飞等《从〈再也不得安宁〉的语言探析非洲社会原貌》等。此外，近年相关译介资源的进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该板块的问题视野，如孙晓萌于 2023 年译介的《非洲语境中的语言、文学与写作》，即为国内学界理解非洲文学中的语言问题提供了新的参照。

从方法上看，该方向主要沿着文学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的相关视阈展开，分析对象虽是语言，但本质上属于文学研究的延伸，只不过将语言问题凸显出来作为理解非洲文学文化经验的入口。局限也较为明显：研究对象相对集中，对少数经典作家和典型论争依赖较强，未能形成更广泛的、扩展开的问题意识。且核心服务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对语言本身描写的推进有限，属于非洲语言研究谱系中的一条边缘线。这再次说明，非洲语言总是依附于其他学科议题而被讨论，难以形成独立的问题域。

整体来看，国内非洲语言研究虽然已经形成了四个清晰的板块，但却并不是均衡展开的。政策与社会语言学研究形成最早、体量最大，也最具建制化基础；应用语言学研究随着中非交流的深化而较快增长，现实导向尤为鲜明；结构语言学和类型学研究最接近语言学本体，却长期薄弱，近年才开始出现自觉的拓展；文学语言研究更多依附于非洲文学研究传统，规模最小。

放在学术史的视野下，这样的格局是由这些不同需求或“进入方式”所形成，同时也塑造了与西方非洲语言研究相似又迥异的生态走向。在中国，非洲语言总是在现实框架中被纳入学术视野，因此它首先被理解为进入非洲场域的媒介对象，而并不是一个能够持续生产理论问题的、独立的学术对象。当然，欧洲早期的非洲语言研究同样带有强烈（甚至更强）的工具性，是“直接源于欧洲的殖民扩张需求”，（胡方，2023，p. 118）与科学种族主义纠缠在一起。但中国的工具性依循的是一种后发式的区域研究形态（可概括为“外交-传播-教学-国别认知”），而早期欧洲的工具性则是服务于殖民扩张的知识生产。例如英国有深厚的人类学、社会语言学研究传统，因此其非洲语言研究的底色明显地贯穿了“治理-社会-制度”这条线，而“在文化上比英国更傲慢”的法国（梶茂树，2021），对非洲语言的关注和法语共同体的联系更密，体现出强制度和强语言秩序的特点。当然，“西方”的内部也并不同质，这是中西二者在当下拉开差距的由头。以迈因霍夫（Carl Meinhof）为代表的德国早期实践，学科化地推动了非洲语言研究逐步脱离种族论述，转向更规范的语言本体

描写。20 世纪中叶之后，迅速成为重镇的美国进一步将非洲语言研究纳入现代语言学理论之中，形成了更成熟的资源生态，让其研究能够与语言学理论发展接近同步。从这个层面看，中国非洲语言研究至今仍更多停留在现实议题牵引下的组织阶段，尚难形成足以支撑本体研究展开的稳定格局。

这种差异，又受到国内学术平台限制的进一步固化。就现有情况而言，与非洲研究相关的学术期刊虽不在少数，但真正容纳非洲语言议题的专门平台十分有限。国内与非洲研究相关的学术期刊主要有八本，分别是：1980 年创刊的《西亚非洲》、1998 年创刊的《非洲学研究》、2010 年创刊的《非洲研究》、2015 年创刊的《亚非研究》、2020 年创刊的《中国非洲研究评论》《中国非洲学刊》《非洲语言文化研究》，以及 2025 年创刊的《亚非文论》，此外还有在互联网上以公众号形式定期更新的《北大非洲电讯》。这其中，仅有一本刊物是与非洲语言议题高度相关的，即北京外国语大学创办的《非洲语言文化研究》。如今，《非洲学研究》和《中国非洲研究评论》近年在公开平台上的活跃度明显有限，其它如《中国非洲学刊》、《西亚非洲》也基本偏好政治、历史或经济，仅有几篇文章涉及了非洲语言议题。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亚非研究》开设了语言研究专栏，但大多集中在亚洲语言研究。浙江师范大学的《非洲研究》偶有涉及语言方向的文章，但仅有 3 篇。因而，目前国内对非洲语言研究的主要阵地，只有《非洲语言文化研究》及上文提到的《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非洲语言专栏。平台供给的不足，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议题在学术资源上的积累，也桎梏了方法的推进、研究共同体的形成，让国内非洲语言研究长期呈现“现实议题较强、本体研究偏弱”的总体面貌。

二、国内非洲语言研究的两重失衡与范式重估

在各类现实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内非洲语言议题所形成的路径未能共同导向一个均衡、自足的研究体系，而是逐渐固化出一种向外的、工具性的结构。可以看到，当前国内非洲语言研究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对象地位与研究范式两重层面上的失衡。

（一）对象地位不足与本体研究薄弱

从问题意识来看，当下国内非洲语言研究的症结已不在于“是否”关注到了语言，而关涉主要是以“何种方式”关注语言。增长最快、建制化程度最高的，始终是与政策、传播、教学和中非交流直接相关的方向，而真正以非洲语言内部为对象的研究虽起步较早但数量很少，难以形成延续的问题传统。如张宏明（2020，p. 133）所指出，“注重现实问题研究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特点，也是中国非洲问题研究的传统。”在这一传统的惯性下，语言是一个入口，而不是独立的、具备“正当性”的研究对象，因而被推迟到研究链条的后端。

问题在于，非洲语言并不只是区域研究中的配套知识。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国内已有研究反复论及，非洲语言在声调、音系、形态范式等方面具有的鲜明特征，为非线性音系学、类型学等一般语言学命题提供了重要的证据。以声调为例，非洲多语系中大量语言都包含复杂的、独特的声调现象，这使其不仅能够补充既有理论，还可以帮助推动理论本身的修正，在“音位、区别特征、音系规则、音节结构、声调、重音、元音和谐、语调等方面对音系理论做出很大贡献。”（钱有用，2024，p. 194）从这一点上来说，国内的学者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非洲语言的理论价值，事实上

是这种意识尚未真正转化为稳定的投入。

当代普通语言学的许多分析框架，长期更多建立在印欧语言的经验之上，因此在处理非洲语言、尤其是声调语言时，容易形成一定的解释惯性。例如针对非洲语言声调现象的探讨，欧洲学者往往局限于从欧洲非声调语言中的现象出发，如用重音（Stress）来类比声调，而不是从其他声调语言中的现象出发。李倩（2024，p. 166）指出，庞大的基数与音系差异让西方学者对非洲语的声调研究并不充分，且路径上“大多数以印象式描写为主”。也正因如此，以汉语等声调语言为背景的中国学者，则可能在比较视角，特别是感知经验的层面占据优势，故周晨磊（2023，p. 145）才会认为，欧洲的语言学家往往会惊叹非洲语言的独特表现，而“如果是以汉语为背景的语言学家去研究非洲语言，绝不会感到如此吃惊。”当然，这种优势只能构成新的观察起点，而不能替代对非洲语言本身的深入。这也警示我们需预防矫枉过正的偏误，无论欧洲中心主义还是完全照搬汉语声调的经验和结论，都不可能完全合理地观察非洲语言中的声调现象，因此实证研究显得尤为关键。（李倩，2024，p. 171）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获批的国社科基金项目“类型学视域下汉语和非洲语言声调的实证对比及跨学科应用研究”，表明国内学者已开始尝试将汉语声调经验与非洲语言研究结合起来，并朝着类型学和实证的方向探进。

进一步说，走出语言工具化、弥补对象地位的不足，本质上意味着避免以现实需求单向度地穷尽语言问题。而对这一点从理解到践行的跨越，还须意识到非洲语言除了具备结构层面、理论层面的本体价值之外，其深层也关联着文学、文化、思想及政治经验等一系列意义生成过程。故国内领域未来在补足语言本体研究的同时，还应有意识地向其认识论层面作进一步延展，来确保对非洲语言的了解能够更充分地作为理解非洲经验、进入其担当知识生产方式场域的前提，而不只是被用来把握非洲社会现实的介质。这种延展区别于重复既有的政策研究、传播研究或是文学语言现象研究的路径，而是以一种自觉的意识，要求研究者在讨论相关问题时不再将语言和落点进行“隔离”，而进一步关注语言本身在参与这些经验的组织、知识的表达中的枢纽作用。

语言问题炙手可热的态势，还来自语言研究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传统语言学内部的理论对象，正逐步发展为语言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的资源前提。202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举办的第二届“面向所有人的语言技术”国际会议（Language Technologies for All, LT4All）上，语言技术与多语主义、语言可及性、语言多样性维护等问题被紧密联系在一起^①，语言开始直接进入数字资源建设的关注层面。非洲语言快速介入机器翻译、多语种AI等技术的基础设施层，支撑这一过程的，正是语料的积累、以及对语言本身的研究。从这方面看，国内非洲语言研究的重心与当代语言学发展之间出现了错位，这种错位不仅表明既有积累尚未转化为面向非洲语言的持续研究能力，还意味着现存范式难以回应人工智能时代对该领域提出的前瞻性要求。

^① “第二届‘面向所有人的语言技术’国际会议”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25年2月24日至26日在巴黎总部举办的国际会议，主题为“通过语言技术推进人文主义”。会议介绍明确说明这一会议延续了2019年首届会议关于多语主义、语言保存与数字技术影响等问题的讨论框架。详见 UNESCO. “Language Technologies for All – LT4All 2025.” UNESCO, February 24–26, 2025. Accessed March 13, 2026. 《数字时代多语主义全球路线图》（*Global Roadmap for Multilingualism in the Digital Era: Advancing the Role of Language Technologies*）是该组织2025年形成并发布的战略性文件。该文件提出要通过语言技术促进语言多样性和多语主义，确保各种语言在数字平台上得到公平支持，使所有语言共同体都能够在数字时代获得参与并受益，可见 UNESCO. “Call for Contributions: Global Roadmap for Multilingualism in the Digital Era.” UNESCO, June 11, 2025. Accessed March 13, 2026.

（二）人工智能时代的资源问题与范式错位

因此，第二个大问题，就触及到当代语言学研究范式的变化，这是非洲语言研究“对象化”不足在方法层面的集中体现。长期围绕现实议题展开的后果，就是让非洲语言问题在知识结构上难以进入语言学方法的新地带。21 世纪后的语言学早已与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脑科学、语料库语言学发生深度交叉，数据驱动、实验、计算建模等跨学科协同，业已成为当代语言研究的重要趋势。在这方面，国内非洲语言研究的滞后具有明显表现。除个别以教学为目的而“附带”采用数字手段的尝试外，非洲语言很少成为前沿语言技术的直接对象。方法的不自觉，从根本上阻滞着该领域相应的资源积累。

当然，这一局面的形成也有其客观原因。非洲语言数量庞大、谱系复杂，许多语言至今仍缺乏系统的整理，更遑论长期、连续的田野调查。对研究者而言，从习得到搜集，再到语料的清洗、整理，每一个环节都需要高门槛和长周期，远非单个研究者、某一项课题能够轻易完成。而国内非洲研究本身又长期面临人才不足、平台不足的普遍困境。就语言教学而言，目前国内能够较系统开展非洲语言教学与本科专业建设的高校仍然较少。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现获批开设 20 个非洲语种本科专业，是国内教授非洲语种最多的院系；天津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分别设有斯瓦希里语本科专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也于 2024 年新获批斯瓦希里语本科专业。此外，包括北京大学等个别高校虽已开设豪萨语等课程，但总体而言，非洲语言教学仍主要集中在少数院校，尚不足以支撑更大规模的学科发展，更遑论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小语种专业的学科建设还面临着猛烈的发展压力。加之，与英语、法语等高资源语言相比，非洲语言在全球知识生产体系中本就处于边缘位置，而在国内的学术资源配置中就更缺乏足够的制度支持和人才储备。语言资源的不对等逐渐转化为研究资源的不均衡：缺乏基础资源，研究难以深入；研究难以深入，资源建设更难启动。二者彼此强化，最终形成了一种循环性的低资源困境。

另一边，近两年国际上围绕非洲语言与人工智能的研究推进已十分迅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衬出国内学术布局的迟滞。2025 年，计算语言学领域阿拉比（Jesujoba O. Alabi）团队统计了过去五年 884 篇关于非洲语言的自然语言处理论文，勾绘了该领域近年来明显增长的大趋势，并指出其动力主要来自多语的资源建设和社区主导的研究组织。（Alabi et al., 2025）这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的非洲语言研究并没有停留在技术“垦荒”的状态，而是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协同生产式的新研究生态，这篇文章也标志着 African NLP 在国际上已成为一个被体系化推进的领域。因此，今日论及国内非洲语言研究之“滞后”，已不能再单纯地重复“缺人、缺资料、缺平台”，而必须进一步指出其存在的方法的问题、评测体系的问题，以及最关键的，如何推进与人工智能时代相匹配的问题意识。

范式的错位，表现为研究目标的变化没能及时进入国内的论述。过去谈非洲语言研究，往往只强调其在区域国别问题和文明互鉴层面的意义。事实上，当下的非洲语言是否能够进入数字体系特别是 AI 系统，已经直接关系到这些语言能否被看见、运用，关系到使用者能否以母语进入知识生产

当中^①，这一点在国内吴瑶的《从数字鸿沟到技术复兴：AI 与非洲语言多样性》中已被有所论及。2025 年，杰西卡·奥乔（Jessica Ojo）团队开发的测试平台 AfroBench 将非洲语言大模型评测推进到 64 种语言、15 项任务和 22 个数据集，指出当前的大模型在英语与非洲语言之间存在显著的性能差距。（Ojo et al., 2025）同年的另一套评测体系 Sahara Benchmark 也表明，数据分布的不均会直接反映在模型表现上，许多本土语因可用数据的稀缺而在持续被边缘化（Adebara et al., 2025），非洲语言大模型的评测体系开始初步成形。

人工智能时代的非洲语言研究，已经开始从关注资源的“有无”，进一步转向资源“如何建设、由谁建设、按什么标准建设”的问题。2025 至 2026，是非洲语音资源建设大幅加速的两年。自 2019 年起，以“由非洲人为非洲语言开展研究”为宗旨的非洲语言 NLP 社群 Masakhane 就在国际上持续推动着资源建设。（Nekoto et al., 2020, pp. 2144-2160）2025 年，谷歌公益部门宣布支持 Masakhane 非洲语言人工智能平台（Masakhane African Languages AI Hub），以扩展 40 多种非洲语言的数据技术。（Manyika, 2025）2026 年，谷歌研究团队（Google Research）又发布面向非洲语言语音技术的大规模开放资源项目（该项目名缩写为“WAXAL”），提供覆盖了 27 种非洲本土语言的大规模开放资源，强调其目标是为自动语音识别和文本转语音等系统提供基础设施。

（Siyavora & Diack, 2026）这些动向的本质，是非洲语言研究的支点已经从传统的文本积累转向了开放式的社区协作和本地研究能力的建设。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也改变了我们理解小语种研究的方式：传统意义上相对独立的、强调单语积累的形式，正在逐步被多语协同模式所取代（这是低资源语言能否获得有效支持的关键）。这意味着未来非洲语言能否进入人工智能体系，仅考虑某一种语言是否有足够大的单语语料是远远不够的，能否在更广泛的语言家族和区域层面组织资源，形成可迁移的数据网络，才是“存活”的关键。也正因此，国内相关研究若继续停留在历史式的、个体化的研究层面，就会越来越难以回应人工智能时代对此议题提出的新要求。

当然，技术前沿的推进并不意味着可以绕过基础研究，相反，它使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比以往更加突出。无论是数据库还是语料库，其建设都立于对具体语言结构的把握之上。前端的认识不足，则会导致后续的各种训练都建立在粗疏、甚至错误的理解之上。就此而言，国内对非洲语言结构性知识的掌握仍不充分，这种不足也许会直接影响后端的资源建设效果。因此，这两个问题的实质，是国内非洲语言研究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来满足从对语言的“描写”、到术语规范、到资源的整理、再到技术应用适配的多面需求。本体研究不够扎实，语料标注的资源积累不够，又缺乏与数字技术相匹配的问题导向，三者的脱节，构成了当前这一领域深层的症结。这也是为什么，非洲语言研究在今天已不能仅仅被视为非洲研究的分支，而必须被看作一个协调各方，勾连区域研究、普通语言学 and 语言智能实现的重要节点的原因。尤其是在 2026 年“中非人文交流年”正式启动的背景下，中非教育、文化、出版、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合作被国家进一步纳入人文交流的框架，这不仅为非洲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也让其基础性地位更加凸显和牢固。未来的中国学界若希望在

^① 参见 UNESCO. *Languages Matter: Global Guidance on Multilingual Education*. Paris: UNESCO, 2025. DOI: 10.54675/MLIO7101, 其强调“所有学习者都有权以其理解的语言获得优质教育”。

该领域的研究上实现持续突破，除去在现实议题层面增加关注外，还需要在语言本体、技术与方法之间重建一套更完整的学术布局，来逐步贯通从语言描写、术语规范、语料整理到评测建设和技术适配之间彼此脱节的研究环节，使非洲语言研究不再停留于分散的议题，而能够形成较为连续的知识链条。

三、结语

推进中非关系，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为了回应这一问题，政治、经济、外交、传播等领域，各自在数年间给出了犀利的、“有效”的答案。古尔纳获奖的契机，也让文学这样天然能接入后殖民、世界、身份政治这些成熟话语的体系，形成新的对话热潮。相比之下，语言研究看上去既“慢”又“不显眼”，短期内很难产出有公共可见度的成果，于是常常被挤到后面，成为问题意识排序的尾端。不少研究者自然地认为，只要能通过英语、法语、阿拉伯语进入非洲材料，就已经“够用了”。这种根深蒂固的、重视的是语言的外在承载性的知识惯性，阻碍了对结构、命名、话语等一系列深层问题的追问。而语言一旦只被当作通道而不是对象，它就很难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因为基础薄弱，所以更没人做——因为更没人做，所以基础更加薄弱。年轻学者很难为这个方向压上自己的职业生涯，机构不愿长期投去资源，这也是整个学术评价体系、回报体系长期塑形的结果。

另一方面，区域研究和语言学之间长期没有真正地接上。做非洲研究的人，未必受过严格的语言学训练，因为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的逻辑就是语言工具化；做语言学的人，又未必愿意把研究重心放到非洲语境，觉得不够“高端”。结果就是两边都能谈一点语言，但很少有人真正处在交叉地带，把非洲语言既当作区域研究的基础材料，又当作普通语言学、类型学、语料库研究的对象。这个断裂让学界难以相信，研究非洲语言不仅服务非洲研究，也会反过来推动语言学本身。

人工智能并没有削弱语言研究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提高了语言本体研究的战略价值。这种价值在技术到来之前没有被充分看见、在技术抵达之后也未被深入推进。语言，不是非洲研究的边缘、附属，而是非洲知识生产的入口，也是未来参与全球语言技术、实现文明互鉴的支点。若这一定位不能得到扭转，则无论是文学、国别研究，还是面向未来的数据库、语料库与各种人工智能建设，都将始终缺乏底层的学术支撑。正因此，重估非洲语言研究的地位，是补齐国内非洲研究短板的需要，也是回应数智时代知识生产方式变革的必然要求。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Zhang Tianren ^{ID} <https://orcid.org/0009-0001-7525-2187>

Hu Jiehui ^{ID} <https://orcid.org/0000-0002-6059-5208>

References

- Adebara, Ife, Hawau Olamide Toyin, Nahom Tesfu Ghebremichael, AbdelRahim A. Elmadany, and Muhammad Abdul-Mageed (2025). “Where Are We? Evaluating LLM Performance on African Languag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63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Volume 1: Long Papers),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32704–32731.
- Alabi, Jesujoba Oluwadara, Michael A. Hedderich, David Ifeoluwa Adelani, and Dietrich Klakow (2025). “Charting the Landscape of African NLP: Mapping Progress and Shaping the Road Ahead.”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25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7807–27841.
- Filali, Ferial (2023). “Algeria's Language Policy: Political Choice or Sociolinguistic Strategy?” *African Language and Culture Studies* (1): 84–100.
- Longpre, Shayne, Sneha Kudugunta, Niklas Muennighoff, I-Hung Hsu, Isaac Caswell, Alex Pentland, Sercan Arik, Chen-Yu Lee, Sayna Ebrahimi, et al. (2025). “ATLAS: Adaptive Transfer Scaling Laws for Multilingual Pretraining, Finetuning, and Decoding the Curse of Multilinguality.” arXiv:2510.22037. DOI: 10.48550/arXiv.2510.22037.
- Manyika, James (2025 July 24). “Supporting the Future of AI Research in Africa and Globally.” Google Africa Blog. <https://blog.google/intl/en-africa/company-news/outreach-and-initiatives/supporting-the-future-of-ai-research-in-africa-and-globally/>
- Nekoto, Wilhelmina, Vukosi Marivate, Tshinondiwa Matsila, et al. (2020). “Participatory Research for Low-resourced Machine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in African Languages.” Fin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EMNLP 2020: 2144–2160.
- Ojo, Jessica, Odunayo Ogundepo, Akintunde Oladipo, Kelechi Ogueji, Jimmy Lin, Pontus Stenetorp, and David Ifeoluwa Adelani (2025). “AfroBench: How Good are Large Language Models on African Languages?” Fin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CL 2025,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19048–19095. DOI: 10.18653/v1/2025.findings-acl.976.
- Siyavora, Tavonga, and Abdoulaye Diack (2026 March 6). “WAXAL: A Large-Scale Open Resource for African Language Speech Technology.” Google Research Blog. <https://research.google/blog/waxal-a-large-scale-open-resource-for-african-language-speech-technology/>
- UNESCO (2025). “Call for Contributions: Global Roadmap for Multilingualism in the Digital Era.” UNESCO, June 11, 2025. Accessed March 13, 2026.
- UNESCO (2025). “Language Technologies for All – LT4All 2025.” UNESCO, February 24–26, 2025. Accessed March 13, 2026.
- UNESCO (2025). *Languages Matter: Global Guidance on Multilingual Education*. UNESCO. DOI: 10.54675/MLIO7101.
- Zhao, Shouhui, and Richard B. Baldauf (2012). “Individual Agency in Language Planning: Chinese Script Reform as a Case Study.” *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 36(1): 1–24.
- 费敏 (2018): “津巴布韦语言政策的演变与启示”,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9): 125–127。

- [Fei Min (2018). "The Evolution and Implications of Zimbabwe's Language Policy." *Journal of Hubei Correspondence University* (9): 125–127.]
- 胡方（2023）：“中非语言类型研究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116–127。
- [Hu Fang (2023). "Research on Chinese and African Language Typ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Journal of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6): 116–127.]
- 梶茂树（2021）：《非洲的语言与社会》，徐微洁译。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 [Kaji, Shigeki (2021). *African Languages and Society*, translated by Xu Weijie.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 李倩（2024）：“非洲语言的声调研究”，《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57–172。
- [Li Qian (2024). "Research on Tones in African Languages." *Journal of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1): 157–172.]
- 李文刚（2008）：“试析尼日利亚国家民族建构中的语言问题”，《西亚非洲》（6）：58–63, 80。
- [Li Wengang (2008). "An Analysis of Language Issues in Nigeria's Nation-Building." *West Asia and Africa* (6): 58–63, 80.]
- 刘国辉、张卫国（2019）：“《语言政策与经济学：非洲的语言问题》评介”，《语言战略研究》（4）：92–96。
- [Liu Guohui, Zhang Weiguo (2019). "A Review of Language Policy and Economics: The Language Question in Africa." *Chinese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4): 92–96.]
- 姆图立·布泰莱兹（2024）：“基于教学目的对祖鲁语和汉语元音的描述（英文）”，《非洲语言文化研究》（1）：18–67。
- [Buthelezi, Mthuli (2024). "A Description of Zulu and Chinese Vowels for Pedagogical Purposes." *African Language and Culture Studies* (1): 18–67.]
- 钱有用（2024）：“非洲语言音系研究的理论贡献”，《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73–195。
- [Qian Youyong (2024).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African Language Phonology." *Journal of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1): 173–195.]
- 吴瑶（2025）：“从数字鸿沟到技术复兴：AI 与非洲语言多样性”，《中国投资（中英文）》（5）：84–86。
- [Wu Yao (2025). "From Digital Divide to Technological Revival: AI and African Linguistic Diversity." *China Invest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5): 84–86.]
- 张宏明（2020）：“中国的非洲研究 70 年述评”，《中国非洲学刊》（1）：126–142, 159–160。
- [Zhang Hongming (2020). "A Review of Seventy Years of African Studies in China." *China-Africa Journal* (1): 126–142, 159–160.]
- 周晨磊（2023）：“非洲语言及其类型特征”，《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128–146。
- [Zhou Chenlei (2023). "African Languages and Their Typological Features." *Journal of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6): 128–146.]